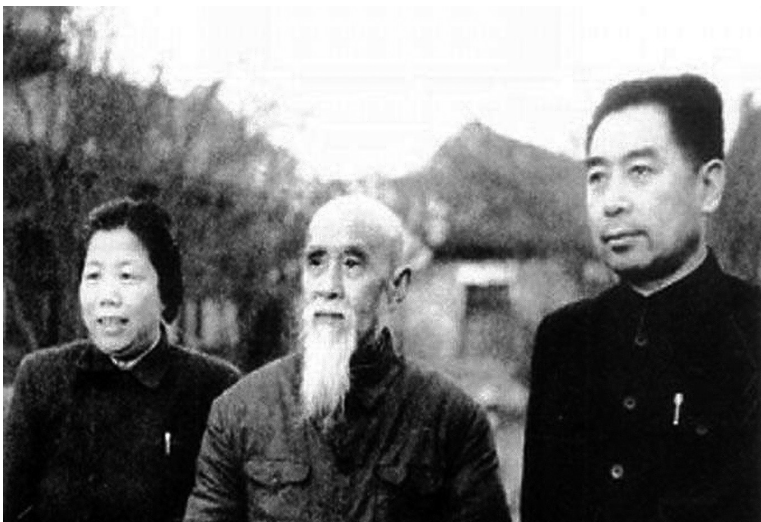


周恩来的六伯父周嵩尧

□ 秦九凤



珍十分器重周嵩尧，极力保荐他，终于使他被委任为邮传部侍郎掌路政司。周嵩尧上任后政绩斐然，《新语林》记载道：“周岫芝以部郎入浙，查办淞沪杭甬铁路工，秉公无私。”这段记载对周嵩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民国初年，周嵩尧还曾获得国民政府表彰的二等文虎勋章和二等嘉禾勋章。

1915年，周嵩尧因不同意袁世凯称帝遭袁冷落而卸职返回淮安。1929年，周嵩尧携全家移居扬州。迁扬不久，周嵩尧就因其声望参加了当时由凌鸿寿主持的“冶春后社”。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不久，扬州陷落，由于他的才干和声望，日伪方面多次请其出山，要他为“大东亚共荣”和中日“亲善”效力。周嵩尧始终不为所动，坚持隐居，最紧张时不得不举家避居乡间，以躲开日伪的纠缠。1946年当他得悉七侄周恩来率中共代表代表团抵南京时，顿时喜出望外，立即变卖一些家常物件，凑足路费赶往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与周恩来晤谈。

周嵩尧在平生赋闲生活中还收藏了大量古玩器、古玉器、古字画、古钱币等。新中国成立之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周嵩尧把自己收藏几十年、已传世200余载的清初王云画的一本山水画册通过中央文史研究馆捐献给国家，以期变卖后买飞机、大炮等武器，后来因为当时还没有文物商店，无法出售。此举虽未获成功，但却表现了周嵩尧的一腔爱国情怀。1953年9月他病危后将自己收藏观赏一生的20多件精品遗赠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全部交给国家。

“山河百战归民主”。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周恩来即致信

六伯父，邀他进京议事。周嵩尧遂由扬州登船经镇江乘火车赶赴京城，在中南海西花厅与七侄周恩来相见。周恩来一见面就高兴地对他 说：“这次一来，就‘既来之，则安之’了。”

周恩来常把周嵩尧请到西花厅，向他请教清朝和民国年间政府各级机构的建制、职能、人员配备、工资安排等问题，以便让人民政府参照采纳或废止，或修订。周嵩尧都一一耐心解释。他欣慰自己老有所为，而一向谦虚谨慎的周恩来则多了一位很好的能够就近随时请教的“老师”。

1951年，中央文史研究馆筹备期间，由政务院常务副秘书长齐燕铭推荐、周恩来批准，于同年6月正式聘请周嵩尧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首批馆员。首批聘到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人都是清末和民国年间德高望重的硕学名流，如符定一、章士钊、齐白石、陈半丁等。安排他们都有照顾性质，所以周恩来在聘用周嵩尧这一职务前曾对他的六伯父说：“民国年间你有两件德政，人民不应该忘记：第一，你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任上平息了江浙两省的一场军阀战争，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战火涂炭；第二，袁世凯称帝时，你作为他大帅府的一名秘书却没有跟他走，这是政治上很有远见的做法。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

周恩来正是出于对六伯父上述两件德政以及他有多年对文物古籍研究经验的考虑，才安排聘用周嵩尧为第一批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也是周恩来担任一国总理26年间，唯一一次直接聘用他自己的亲属，是内举不避亲的典范。

（上接1版）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开展一次考核，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进行。主要考核减贫成效、精准识别、精准帮扶、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树立脱贫实效导向，确保脱贫攻坚质量。

重点工作稳步推进。一是完成建档立卡。2014年4月至10月，全国组织80万人进村入户，共识别128万个贫困村、8962万贫困人口，建立起了全国统一的扶贫开发信息系统。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全国动员近200万人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补录贫困人口807万，剔除识别不准人口929万，识别精准度进一步提高。二是开展驻村帮扶。全国共选派77.5万名干部驻村帮扶，期限1至3年。选派188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党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着力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战斗堡垒作用。三是推进分类施策。按照“五个一批”的工作思路，突出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劳务输出扶贫，在广东、湖南、湖北进行精准对接试点，并在全国推开。实施教育扶贫，促进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倾斜。实施健康扶贫，组织动员80万基层卫生计生人员逐户逐人逐病核实，分类救治贫困患者100多万人。探索生态保护脱贫，安排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走上护林员岗位。推进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进行有效衔接。四是加强资金管理。修改完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推进扶贫资金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到县比例从2014年的70%提高到2016年的95%。五是动员各方参与。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调整完善结对关系，东部发达地区267个经济较强县（市、区）结对帮扶西部406个贫困县。加强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中央出台定点扶贫指导意见，中央层面共有320个单位定点帮扶592个贫困县，军队和武警部队结对帮扶2000多个贫困村。动员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扶贫脱贫攻坚，国务院国资委组织45家中央企业开展“百县万村”行动，全国工商联动员22万家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行动。

考核评估较真碰硬。为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中央明确要求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开展2015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工作成效试考核，根据试考核情况对中西部20个省开展了督查，对2个省开展了巡查。2017年初，组织开展2016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工作成效正式考核。一是组织省际间交叉考核。从22个省抽调476名司处级干部组成交叉考核工作组，通过随机抽样，分赴22个省的108个县、605个村，入

户调查806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脱贫户、一对一访谈基层干部3216人。二是开展第三方评估。主要评估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因村因户帮扶工作群众满意度，以及“两不愁三保障”实现情况。委托第三方组织22个评估组，赴22个省的117个县、630个村，对1500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和6600个脱贫户开展评估。三是收集考核数据。收集各省总结报告，贫困监测数据和建档立卡数据，财政部、扶贫办提供的2016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绩效评价结果，中央纪委机关、审计署和社会监督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扶贫领导小组督查巡查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民主监督提供的情况。四是综合汇总分析。考核工作小组结合收集的情况和各省总结，按照定性定量相结合、第三方评估数据与部门数据相结合、年度考核与平时掌握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对22省份2016年脱贫攻坚成效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考核意见。五是运用考核结果。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对综合评价好的省份通报表扬，并在2017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上给予奖励。对综合评价较差且发现突出问题的省份，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约谈政主要负责人。对综合评价一般或发现某些方面问题突出的省份，约谈分管负责人。考核结果送中央组织部，作为对省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评价的重要依据。

经过一年努力，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全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240万，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第4年减贫超过1000万人，改变了以往减贫幅度逐年大幅递减的趋势。井冈山、兰考等县率先脱贫摘帽，产生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再上新台阶

必须看到，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少困难和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基础薄弱的农村做精准的事情，难度和挑战之大前所未有的，攻坚任务十分艰巨。2017年是全面攻坚的关键一年，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化之年。国务院扶贫办将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围绕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个中心任务，以集中攻坚、稳定脱贫为工作重点，以扶贫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推动力量，深入实施重大扶贫工程，落实区域支持政策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强化脱贫攻坚支撑保障体系，全力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再完成1000万以上减贫任务，以脱贫攻坚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帮助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满足贫困人口追求幸福的基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是一项极其重要、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将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深化精准扶贫。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只要是贫困人口，不管什么原因、什么类型，都纳入建档立卡，实施分类扶持。通过宣传引导、组织培训和“干中学、学中干”，逐步提高基层干部和驻村干部的能力和水平。突出产业扶贫，组织好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好劳务输出扶贫，落实好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政策，加强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有效衔接。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应当是享受过扶持政策，得到了帮扶，观念有转变，能力有提升，有稳定的收入渠道。

集中力量攻坚。对深度贫困地区，着力强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为稳定脱贫创造环境条件。对贫困村，组织实施贫困村提升工程，着力加强贫困村基层组织建设，培训创业致富带头人，吸引回流本土人才，培育壮大集体经济，培养“不走的扶贫工作队”。对因病因学致贫返贫，突出解决贫困家庭、慢性病和学生上学问题。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难中之难、坚中之坚的地方，要采取超常措施加以扶持”的重要指示，进一步加大政策供给力度，使工作力度与攻坚难度相匹配。

解决突出问题。督促指导各地结合实际，科学制定年度脱贫摘帽计划，调整完善滚动规划。加强全方位监督检查，确保脱贫质量。从加强思想教育、改进工作作风、严格执行制度、强化监督问责、提升干部能力素质等5个方面，着力纠正不严不实、弄虚作假等问题。完善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加强审计、财政监督和群众、社会监督，加大对扶贫领域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努力做到阳光扶贫、廉洁扶贫。改进帮扶方式，扩大贫困群众在帮扶项目各个环节的参与度。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把一些帮扶政策和贫困群众参与情况挂钩，鼓励光荣脱贫、勤劳致富。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逐步改变陈规陋习。

完善考核工作。进一步提高考核的针对性有效性，确保考核评估质量。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以较真促认真，以碰硬求过硬，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刘邦能用人之长，用得其所

读《史记》，刘邦给人感觉颇有点人格分裂。他一方面“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另一方面又完全是一个地痞无赖的形象。比如，面对前来拜访的儒生，他把人家帽子抢过来，“床溺以辱之”。给吕公送贺礼，明写“贺钱万”，实际不持一钱。

然而，这样一个明显“私德有亏”的人，何以终能成大事？分析起来，当是刘邦卓越的用人策略，使其终得天下。而在其无赖之个性与用人之大节“短兵相接”时，刘邦亦能立时变倨为恭。这充分表明，他不会以私废公、因“慢而侮人”的个性而坏了用人治国的大事。这正是雄主的共有特征，始终分清轻重，有个性却绝不任性。

比如，在攻秦不力的时候，高阳城的“监门”酈食其觉得刘邦是个气度宏大的仁厚长者，便想劝说刘邦。不意刘邦正在“床席而足”，这个动作可说是刘邦“慢而侮人”的一个病征。见此，酈食其也只是长揖不拜，只说了句“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刘邦便“起，摄衣谢之，延上坐”。其动作之快，估计中间都没有过渡，像冰块遇高温直接从固态变为气态一样。正是这一变，酈食其献计，而刘邦用其计，便夺取了秦军储备的大批粮食。刘邦也因此封酈食其为“广野君”，并用其弟酈商为将。

刘邦变脸之速，从一个侧面表明其爱才惜才之甚。面对人才他能礼贤待之，虚心听取并采纳意见，绝不任性而为。相形之下，项羽可以说是过于任性，虽然也能“仁而爱人”，更有“嗜噍叱咤，千人皆废”之勇猛，但“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这说明，在用人大事上，刘邦绝不允许自己的个性坏大事，而项羽好逞匹夫之勇，刘项之高下立判。

刘项何以一得天下一困垓下——刘邦用人史话（上）

□ 陈家兴



《大风歌》 朱沛然

大。萧何在刘邦心中的地位，靠的正是实干。

草莽之际，雄主与贤才，往往惺惺相惜。不过，刘邦与萧何之间，倒是萧何更有“先见”。在刘邦还是平民触犯法律时，小小的刀笔吏萧何就多次袒护过他。刘邦当了亭长，萧何更是经常帮助他。大家为刘邦出差凑盘缠，别人给三百钱，唯独萧何给五百。在萧何看来，刘邦终非池中物。

刘邦起兵当了沛公，萧何就担任县丞帮刘邦处理事务。刘邦入咸阳，将领们奔着金银去，唯独萧何先奔入丞相府把律令图书都收藏起来。后来，刘邦当了汉王，就任命萧何为丞相。

这些细节表明，刘邦是通过实践发现萧何的过人之处。这种草莽寒

微，是雄主遇贤才的最佳场合，可谓知根知底，心中有数，最信得过。当然，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相遇，不说千载难逢，在世间也实属不易。

然而，所谓信得过，往往是要用事实说话的。在刘邦带领人马在外攻城略地时，萧何每每用事实证明，他不仅有治理之能，更有忠诚之心。比如刘邦从汉中出发去兵定三秦时，萧何以丞相身份镇抚巴、蜀；刘邦邀请侯以击项羽时，萧何镇守关中，同时还在后方制定了各种法律规章。但他做这些事之前，都要先向刘邦请示，刘邦同意他这才办。有些事来不及事先请示，事后也会向刘邦报告。这可谓始终恪守臣子的职责与本分，在位不缺位，更不越位。

刘邦多次被项羽打得兵败人逃，萧何总是及时把关中的壮丁调来补缺。前方打仗所需的粮草，萧何总是及时送到。可以说，萧何成为刘邦出征战时最稳固的大后方。后来，刘邦便把关中的一切事情全部委托给萧何处理。没有亲密无间的信任，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重赏“猎人”，“猎狗”次之

在刘邦平定天下，论功行赏、大封群臣时，“群臣争功”，竟然“岁余不决”。但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封他为酈侯，给的领地也最多。不料功臣们都不服，于是刘邦君臣之间便有一番番著名的谏话。

据《史记》记载，大家当时说：“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

当时刘邦给大家讲了一个猎人与猎狗的故事。“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你们做的是猎狗的事情，而萧何做的是猎人的事情。而且你们多数只有一人追随我，多的不过两三人；人家萧何整个家族几十人都跟着我，“功不可忘也”。刘邦的比喻今天看来有点不尊重人，这于他倒是一贯的，却是深刻在理，萧何正是这种统揽全局、通达战略型人才，其他则是在其全局与战略中攻城略地型的人才。但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攻城略地的具体成果，以为盖世

奇功，却往往看不到他们何以能攻城略地建奇功。能看到这个“何以能”，正是雄主之长处，也唯有能看到，雄主也才能真正吸引到大贤。当时，“群臣皆莫敢言”，估计内心不服的人也还有，只是不敢再说罢了。

封侯完毕，在评列侯位次时又发生争执。大家都说，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这时，刘邦不再好驳回功臣们的意见，但心里仍想把萧何排第一。这时关内侯鄂千秋的一番话，说到了刘邦心坎上。

鄂千秋说，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不过是一时之事。皇上同项羽对抗五年，多次损兵折将，然而萧何总是及时地把新兵从关中送到前线，不用皇上下命令，几万人就送到了。这已经有好多次了。军中没有粮草，萧何通过水旱两路从关中运到前线，使军队给养不乏。皇上虽然几次地丢掉了东方的大片土地，而萧何却牢牢地保住了关中给皇上做根基，这才是万世不朽的功勋。“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于是，刘邦把萧何排在第一。这一番分析，其精神实质和刘邦上面的比喻是一致的。一如下国棋，布局落子之人，与具体某子发挥特殊效力，其功勋当然不在一个层次。布局不当，即便以人力与小智能在局部小胜，也难掩全局必输的结局。布局得当，则即使局部小败，也有全局必胜的定局。

萧何的封侯定位两事，充分说明刘邦非常看重论功行赏的科学性。论得不合理、赏得不科学，往往就起不到吸引人才、激励人才的效果。甚至论得不精准、赏得不精确，都可能影响到人才的成色。为什么有的雄主能得一流人才，有的君主只能得次优人才，其原因盖乎于此。